




了如指掌

约翰·密尔自传

大师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英】约翰·密尔 / 著
柏洋 /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了如指掌

约翰·密尔自传：大师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英】约翰·密尔 / 著 柏洋 /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翰·密尔自传：大师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 (英)
密尔著；柏洋译. —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2.1
(了如指掌文库)
ISBN 978-7-5392-6402-8

I. ①约… II. ①密… ②柏… III. ①密尔, J.—自
传 IV. ①B56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0249号

约翰·密尔自传：大师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YUEHAN MI'ER ZIZHUAN: DASHI SHI ZHEYANG PEIYANG CHULAI DE

作者：【英】约翰·密尔

译者：柏洋

出品人：傅伟中

策划：熊侃

组稿编辑：万哲

责任编辑：洪晓梅

特约编辑：丁纪红

装帧设计：sddoffice.com

出版：江西教育出版社

发行：江西教育出版社

社址：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330008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2.5

字数：170千字

版次：2012年2月第1版

印次：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刷：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书号：ISBN 978-7-5392-6402-8

定价：29.80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0791-86710427（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赣版权登字-02-2011-38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童年时代和早期教育 / 1

少年时期所受的思想影响，父亲的性格和观点 / 23

教育的最后阶段，自学的初级阶段 / 41

青年时代的宣传事业，《威斯敏斯特评论》 / 55

成长中的一次危机，向前冲阶段 / 85

最珍贵友谊的开始，父亲去世，1840年前的著作及其他 / 119

晚年概略 / 143

童年时代和早期教育

在写这篇自传的正文之前，似乎应该说明一下，我为什么要为纪念如此平凡的一生而写上这样一本书。我从来没想过，我所讲述的东西能引起任何公众的兴趣，无论它是一个故事也好，或是与我有关也罢。但我想，我成长和生活的时代是英国历史上最重视教育和教育改良的时代，也许，我应该记录下一些不同寻常、引人注目的教育经历。无论这种教育方法还产生了什么影响，都可以证明早期教育是能教给小孩子东西的，而且效果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好得多，用惯常的教诲方式教育孩子几乎浪费了孩子的童年时代。我还认为，在观念转变的时代，如果有人勇于探索，在不断地对自己和他人的思想有所吸纳的同时，又能有所扬弃，那么，若把他各个阶段的思想记录下来，想来不仅有益，而且十分有趣。但对于我而言，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动机，那就是希望借此向曾经帮助我提升智力水平与道德水准的人致谢。他们当中有人声名显赫，

有人能力卓著，却尚未得到应有的赞誉；还有我最需要感谢的一个人，如果我不借这本书对他致谢，外界也许根本没有机会了解到他这样一个人。如果哪位读者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却还要硬着头皮往下读的话，那只能怪他自己了，我可没奢望他能手不释卷地看我的自传，我只求他能明白，这本自传并非为他而作。

1806年5月20日，我出生在伦敦，是家里的长子，我的父亲是詹姆斯·密尔，也就是《英属印度史》的作者。我祖父是安格斯郡诺斯沃特桥的一名小商人，（在我看来）也同时是个小农场主。父亲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因其天资聪颖而得到费特凯恩的约翰·斯图尔特爵士的关注，他是苏格兰财政部的一位贵族，而后又接受了简·斯图尔特夫人（约翰·斯图尔特爵士的妻子）和其他几位夫人成立的基金资助，前往爱丁堡大学深造。该基金的设立旨在为苏格兰教会培养青年才俊。我父亲在那里接受了常规教育，获得了传教士资格，但他从未真正从事过该职业，因为他太了解自己了，深知自己不可能相信这个教派或其他任何教派的教义。有几年，他在苏格兰为多个家庭做家教，其中包括特威代尔侯爵家。但他最终定居伦敦，致力于写作事业。1819年，他受聘于东印度公司，这才有了除写作之外的其他收入来源。

在父亲的一生中，有两件事不能不提：一件其实很平常，另一件却极不寻常。一件是，他当时没有什么收入来源，只能靠向期刊投稿这种不稳定的方式维持生计，可是他居然还能娶妻生子，组建了大家庭；这种行为无论从理智上、还是从责任上，都与他的人生观，至少是后半生坚持的人生观大相径庭。另一件是，这种生活方式需要异常充沛的精力，从一开始，他的处境就很不利于写作，结婚也没给他带来什么积极因素。那么多年，他只靠写作，光是养活一家老小，还能做到从不欠债，也不捉襟见肘，就已经相当不易了。但他居然还能坚持自己的政治和宗教观点，引得当时所有权贵和英国普通富人对他空前绝后地厌弃；父亲是一个信念非常坚定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写出背弃自己信念的东西；而且只要环境允许，他会尽可能地把他的信

1820年代的爱丁堡大学。

念融入到作品当中。可以说，他是一个做事兢兢业业的人，不管是文学方面的工作，抑或是其他工作，他都倾注全力，力求完美。尽管身肩重任，他却还是策划、启动并最终完成了《英属印度史》的



编纂工作；整个工作大约花费了十年时间，编纂这样一部大部头作品，况且还是一部需要大量阅读资料、研究史书的作品，和其他作者（甚至是一些专职作者）比起来，十年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工作算是很快的了。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几乎每天他都要投入很长时间教导孩子。拿我来说，他在我身上倾注了超出寻常的精力、关爱和耐力，按他的构想，就是努力给孩子最高层次的智力教育。

一个做事恪守时间观念的人，很有可能在教育学生时也是如此，我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希腊语的，只听人说是三岁，我对这件事最早的记忆就是背诵父亲写在卡片上的普通希腊语单词表，后面附有英语意思。学语法已经是几年后的事情了，最开始学时，只涉及动名词的曲折变化，但是一学完单词以后，就马上着手学习翻译了。我模糊地记得我读过《伊索寓言》，这是我读的第一本希腊语书籍；第二本是《远征记》，我对这本书的印象还深刻一些。我八岁才开始学习拉丁语，那时候，在父亲的指点下，我已经阅读了大量希腊散文家的作品，其中包括希罗多德的全部作品，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和《回忆苏格拉底》；读了第欧根尼·拉尔修写的一些哲学家生平；还读了卢安奇的部分作品以及伊索克拉底的《全希腊盛会献词》和《泛雅典娜节献词》的部分章节。1813年，我读了柏拉图对话录（按普通排列顺序）

约翰·密尔的社会主张。



的前六卷，从《尤息弗罗》到《泰阿泰德》。我斗胆认为《泰阿泰德》在此可以忽略，因为对于我来说有点晦涩难懂。但父亲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求我尽力做到能力所及之事，还极力要求我做远远超乎我能力之外的事情。我和他在同一个房

间里的同一张桌子上学习，他写作，我学希腊语，就这样，我完成了希腊语的所有功课。从这件事上或许可以看出，为了教导我，他还是乐于承担责任的。那时，没有希腊语英语词典，我又没有学拉丁语，根本无法查阅希腊语拉丁语词典，所以碰到不认识的单词，我就不得不向父亲讨教。父亲其实是个急脾气，却甘心忍受这种无休止的干扰，而且还在这种干扰下写出了好几卷《英属印度史》，外加那几年必须要写的所有其他文章。

在那段童年时光中，除了希腊语，我唯一的一门功课就是算术了，也是父亲教我的。算术课的上课时间安排在晚上，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我学得多么不开心。课上所学只是我每天所受教育的一部分。另外一大部分是靠我自己阅读，以及父亲对我的口头教导，我们一般在散步时进行这种口头教导。从1810年到1813年底，我们住在纽因顿格林，当时，那里的环境和农村没两样。父亲的身体又需要坚持锻炼，每天早饭前都在通往霍恩西的林荫小路上散步。这时候，我会陪在父亲左右，野草闲花的最初记忆和前一天的阅读成果相互交织，共同编织成那时那景。向父亲作阅读内容汇报完全出于自愿，

而并非是被父亲强迫的。我边读书，边在纸片上做笔记，早上散步时，就按笔记上的内容给父亲讲故事，因为我读的书大部分都是历史书。以这种方式我读了很多书：罗伯逊的历名著作，休谟和吉本的作品。但当时以及后来的很长时间，沃森的《腓力二世》和《腓力三世》才是我的最爱。书中描述的马耳他骑士英勇抵抗土耳其人的事迹，荷兰反叛省份抵制西班牙的顽强，都激起了我强烈而持久的兴趣。我第二喜欢的历史著作是胡克的《罗马史》。那时，我还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希腊历史，只在学校课本上看到过节选，以及由罗林编纂的《古代史》翻译本中，从马其顿国王腓力开始的最后两三卷内容。霍恩翻译的普鲁塔克的作品我也读得津津有味。在英国历史方面，休谟停笔后，我记得读过柏内特的《当代史》，但我只喜欢里面的战争篇章。我还读了《年度纪事》里面从开头到大约1788年的那部分历史，父亲从边沁先生那里借来的几卷书里漏下了这一部分。困境中的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科西嘉爱国人士保利，都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再说美国独立战争，因为少不更事，我站到了错误的英国立场上（直到父亲拨乱反正）。父亲经常和我一起讨论我读的书，他亦常借此机会给我讲解一些概念，比如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政府，什么又是道德和心智养成，然后让我用自己的话复述给他听。他还让我读了很多我不感兴趣的书，同样也要向他复述。在这些书籍中，米勒的《英国政府历史观》在早先享有盛誉，父亲也对其倍加推崇。另外还有莫斯海姆的《基督教会史》，麦克里的《约翰·诺克斯传》，甚至还有休厄尔和拉提的《贵格会教徒史》。他喜欢让我领略书中主角在艰难环境下所展现出来的能力和智慧，以及顽强战胜困难的精神。在这些书里，我还记得比弗的《非洲大事记》，还有柯林斯在其书中对新南威尔士第一批移民的描述。还有两本书我百看不厌，一本是安森的《航海记》，大部分年轻人都喜欢；另一本是《环球航海记》（我认为是霍克斯沃思撰写的），共四卷，从德雷克开始，到库克和布干维尔结束。那时，我几乎没有玩具可玩，也没有儿童读物看，有也是亲朋好友送给我的，《鲁滨孙漂流记》是最好的一本，我小时候一直都喜欢读这本

书。父亲也不是完全不让我读消遣的闲书，他偶尔也会开恩。不过，他自己本来是几乎没有这类书的，为了我而借了几本，我记得有《一千零一夜》，卡佐特的《阿拉伯故事集》、《堂吉诃德》和埃奇沃思女士的《通俗故事集》，还有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布鲁克的《上流社会的傻子》。

八岁起，我开始和我的一个妹妹学习拉丁语，我一边学一边教她，然后再由她向父亲汇报课程。后来其他兄弟姐妹也陆续加入，成了我的学生，白天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备课。虽然我很以此事为累，因为我要像对待自己的功课一样认真对待他们的功课。但实际上，我从中受益匪浅，通过授课，我学得更全面，记得更牢固。教学时向别人解释难点，这种实践即便对于小孩子来说也是极有用处的。就其他方面而言，我童年的经历并不适合于小孩子互教的方式。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教学效率极其低下，师生关系更是糟糕透顶。就这样，我学完了拉丁语法，读罢科尼利厄斯·内波斯的作品和恺撒《回忆录》的大部分内容。除了要督导这些课程外，我后来又自学了很多内容。

开始学习拉丁语那年，我初次接触到了希腊诗人的作品，其中以《伊利亚特》为首。父亲见我已在此方面颇有进展，便开始让我读蒲柏的译作。此书成为第一本我最喜爱的英语诗作品，而后再成为我多年的挚爱，从头到尾读过二三十遍肯定是有的吧。这是一本叙事和韵律著作的优秀典范。后来我发现有很多男孩子其实并不喜欢这本书，但我却因此觉得此书更值得一看了，而且从理论和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年少的我对这本书的喜爱之情是油然而生的。在那之后不久，父亲又开始指导我学习几何和代数了。

我记得，从八岁到十二岁，我读的拉丁语书籍有维吉尔的《牧歌》以及《埃涅伊特》的前六本，除《抒情诗》外的贺拉斯全集，费德鲁斯的寓言故事，李维《罗马史》的前五卷（因为喜欢这个题材，闲暇的时候，我自发阅读了前十卷的剩余部

瓦尔特·司各特雕塑，该雕塑由约翰·斯蒂尔完成，现位于爱丁堡王子街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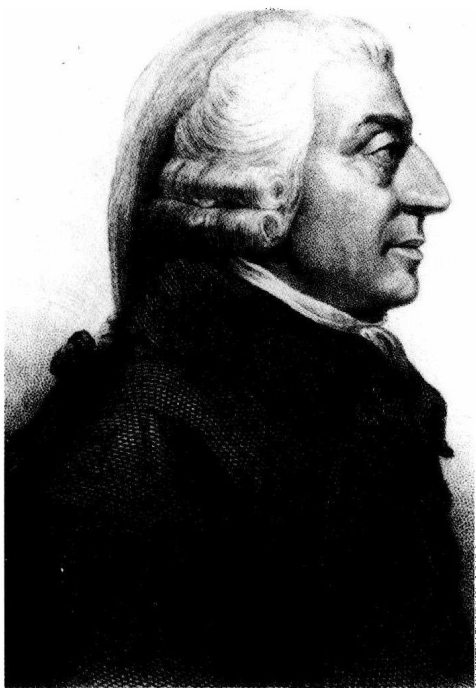
分），萨卢斯特全集，奥维德《变形记》的一部分，还有泰伦斯的几个剧本，卢克莱修的两三本作品，西塞罗的多本演说集和与演说相关的著述，以及他写给阿提库斯的书信。父亲不厌其烦地把蒙戈尔特书中用法语写成的历史说明注解翻译过来。我通读了希腊语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的一两个剧本（但从中得益甚少），修昔底德全集，色诺芬的《希腊史》，狄摩西尼、埃斯基涅斯和利西阿斯作品的一大部分，忒奥克里托斯、阿那克里翁的全部作品，《文选》的一部分，狄奥尼修斯的少部分作品，波利比奥斯所著的多本作品。最后当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这是我读过的第一本有



关道德，或是说有关心理学的科学专著，书中包括很多古人对人性及人生精妙绝伦的见解。父亲让我细细研读，还让我把里面的内容罗列成一览表。在那些年中，我全面地学习了初级几何和代数，但微分学和高等数学的其他部分却学得差强人意，原因是父亲把早年所学忘得一干二净，也没有时间再重拾起来，所以也就没法帮我授业解惑了。我只能向书本求助。那时我总是因为无法解开难题而招惹父亲不快，但他并没有看到，我无法解开难题的原因是我根本不具备此方面的必要知识储备。

说到我私下阅读的书籍，我只说说自己还能想起来的。我最喜爱历史题材的书籍，古代史更是我的最爱。我一遍遍地读着米特福德的《希腊史》，父亲提醒我要警

亚当·斯密的画像，该画像创作于1787年。



惕作者的保守派偏见，以及那些为了美化暴君、诋毁民主制度而被扭曲的事实；他用希腊演说家和历史学家当例子，向我讲述那些观点，结果在读米特福德时，我和作者的观点总是相反的，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能对他的观点反唇相讥；但每次读这本书都能给我带来新鲜愉悦的感觉。再说说我曾经的最爱，胡克和弗格森的罗马史仍能给我带来持久的快乐。再有就是《古代通史》，尽管有人说它风格单调乏味，但我却很喜欢读，通读过多遍之后，我对那些最不知名的古人生平都耳熟能详，但现代史方面，我除了对荷兰独立战争

这样的独立章节相对熟悉之外，对其他的知之甚少，也不太关注。纵观我的整个少年时代，我心甘情愿且十分上瘾的事情就是我所谓的“撰写历史”。我前后写成了《罗马史》一部（摘选自胡克《罗马史》），《古代通史》节略本一部，《荷兰史》一部（选录自鄙人最爱的沃森作品和一部匿名汇编）。十一二岁的时候，我专注于创作一些自诩严肃的题材。我的创作不亚于一部罗马政府历史，我所编辑的资料都源于李维和狄奥尼修斯（也同样得益于胡克），我写的东西多得都可以出八卷书了，其内容一直延续到颁布李西尼法的时代；实际上它记述的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当时我仅对其中罗马征战的相关内容感兴趣。我讨论书中出现的每一个与体制相关的观点，尽管我对尼布尔的研究成果一无所知，所幸有父亲的指导，再参照李维的论据，我证明了农业法的正确，还尽我所能地支持了罗马民主党。几年后，我却因为蔑视自

己孩子气的努力而毁掉了这些文章，那时我根本没想到，以后还会对这些初试牛刀的写作和推理重新燃起兴致。但父亲却很是鼓励这种对我大有裨益的娱乐，但他从不要看我的东西，不过我觉得这倒是挺明智的。因为如此一来，我就不会觉得写作是为了要对谁负责，也不会因为被一双挑剔的眼睛盯着而胆战心惊。

尽管撰写历史的练习从来不算是必修课程，但有一样理所当然是必学的，那就是写诗，可那也是我最不喜欢的功课之一。我没有写过希腊语和拉丁语诗，也没学过这两种语言的格律，父亲认为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不太值得，所以他只是让我大声朗读出来，指出不对的地方即可。我也从没用希腊语写过东西，甚至连散文也没写过，只用拉丁语写过一点点文章。不是因为父亲不在意这几种语言的应用自如，以及这种应用对写作的重要，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他要求我写的是英文诗歌。第一次我读到蒲柏译本的《荷马史诗》时，就立志要写部类似的著作，而且我真的写了相当于《伊利亚特》续集那么长的一本书。当时，要是没有父亲的命令，我最初写诗的意愿可能就中途夭折了，父亲总是尽量给我解释他要求我做某件事的原因，我记得清清楚楚，关于这件事，他给了我几点原因，都是非常符合他个人风格的理由。一点是，较之于用散文表情达意，诗歌会更清楚、更有力，他说，这可是个实实在在的长处；另一点是，人们大都赋予诗歌高于其本身的价值，因此，获得写诗的能力是必要的。他一般让我自己选题，我记得大多是给一些神话人物或寓言中的抽象形象；他还让我把贺拉斯的很多短诗译成英文；我还记得他让我读汤姆逊的《冬天》，然后让我照猫画虎临摹写作（不参考书籍）。当然，我写的诗纯属废话，我从没学过任何写诗技巧，但这种练习却使我的表达在后来的日子中更得心应手。直到这个时候，我还是没读过多少英文诗歌。父亲曾把莎士比亚的作品放在我手边，想让我读历史剧，然而我却一如既往地读起了其他剧作。父亲一直都对莎士比亚嗤之以鼻，甚至曾严厉地批判这位英国人的偶像。除了弥尔顿（他最崇拜的人）、哥尔德斯密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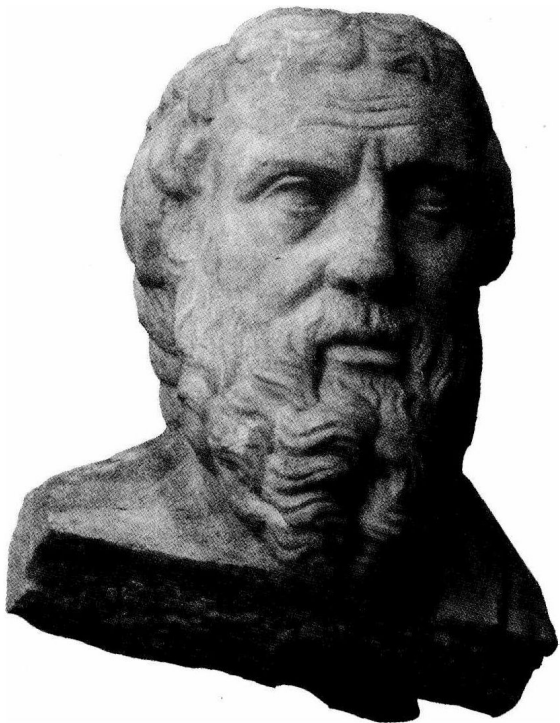
和彭斯的诗歌，格雷的《游吟诗人》（较之《墓园挽歌》，父亲更喜欢格雷的这首作品），柯珀和贝蒂的作品也还可以，但别的英国诗歌他都不喜欢。父亲对斯宾塞的评价也比较高，我记得他为我读了（一般都是他让我读）《仙后》的第一本，但我对此不太感兴趣。因为在父亲眼中，本世纪的诗歌几乎毫无价值，我于是在成年之前，也对当代诗歌十分陌生。但沃尔特·司各特的浪漫诗歌除外，那是父亲推荐的作品，我很感兴趣，因为我一向钟爱活泼的叙事风格。父亲自己则喜欢读德莱顿的诗，于是也让我读了不少，但我只喜欢《亚历山大的盛宴》，我还自己给这首诗，外加沃尔特·司各特的很多抒情诗谱了曲，在心里默唱，那些曲调我现在都还记得。柯珀的短诗我也还是比较喜欢的，但从没读过他的长诗，比起他的那两卷书，我倒是更喜欢他用散文写的三只野兔的故事。十三岁时，我偶然读了坎贝尔的诗，当时就为《洛希尔》、《霍恩林登》、《埃琳的放逐》和其他一些诗作所震撼，这是以前读诗时未曾体验过的。但直至今今，我还是不甚看重长诗。不过，《怀俄明的格特鲁德》气势磅礴的开篇却堪称婉约派登峰造极之作。

童年时，我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实验科学——是理论上，而非实际意义上的实验科学。我没做过实验，甚至都没亲眼看见过，只是在书本上读到过，我常为此感到遗憾。我读起乔伊斯的《科学对话》来，简直是废寝忘食，但父亲却批评说，这部书前面部分的物理学基本定律推理漏洞百出，对此我并不同意。在听到讲座或看到实验之前，有很多年，我贪婪地阅读化学论文，特别是父亲的老友兼校友汤姆森博士的论文。

大概从十二岁起，我接受的教育进入了另一个更高阶段。学习的主要内容变成了思维本身，而非思维辅助和应用了。从一开始学习逻辑学，我就研读《工具论》中包括分析学在内的所有内容，但我从实验分析中收益甚少。实验分析属于推断的一个分支，那时我的心智还不成熟，尚无法理解。在研读《工具论》的同时，父亲还让

希罗多德，古希腊第一个历史学家。

我读了好几篇有关经院逻辑的拉丁语论文，有的通读，有的节选。每天我俩一起散步时，他都会让我详细汇报读过的内容，还要回答他提出的诸多尖锐问题。在这之后，我以相似的方法，通读了霍布斯的《算法和逻辑学》，这本书比起经院派逻辑学家的作品来，其思想层次要高上一大截，父亲对他推崇备至。在我看来，它的价值固然很高，但父亲未免有些夸大事实了。不管要我学什么，父亲都让我尽可能地理



解并亲身体会到它们的效用。他觉得，这种方法在学习三段论法逻辑时最有效，但三段论法的作用受到了许多权威作家的质疑。我清楚地记得，那次在巴格肖特赫斯附近散步时（那时，我们去拜访父亲的老朋友华莱士先生，当时的皇家陆军军官大学数学教授），父亲是怎样尝试用问题激发我对这个题目的思考，又是怎样让我对三段论法逻辑学的效用构成形成一些概念的，碰到我不理解的地方，他就解释给我听。尽管他的解释也没有让我理清问题，但也并非没用，它们成为我的观察和沉思赖以成形的核心。后来我通过自己的观察了解了父亲所作的概括性论述，通过自己的认识和体验，我终于像父亲一样，彻底明白了少年时通晓经院派逻辑学的意义所在。接受教育所获得的思考能力理应归功于此。先是细细剖析错误论点，再找出谬误所在，对于这样的

早期智力练习，我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我从中获得的所有能力都要归功于父亲，是他坚持训练我，让我做这种智力练习，经院派逻辑学以及学习它时养成的思维习惯，是训练的主要手段之一。我相信，在现代教育中，如果经院派逻辑应用得当，就可以培养出逻辑缜密的思想家，这一点是任何训练手段都无可比拟的。这些思想家会赋予文字和命题精准的意义，且不受模糊、不精确或不明确术语的影响，就算是颇具影响的数学研究也无法与其媲美，因为在数学步骤中，正确的推理过程不会产生真正的难题。数学研究也特别适合哲学学生的早期教育，学生通过经验和思考，从而形成有价值思想的缓慢过程不能成为研究的先天条件。他们有可能在自己的思维能力到达一个峰值之前，就能解开思想中那些混乱又矛盾的难题了。因为缺乏这种训练，很多原本有能力掌握这种本领的人却被挡在了门外。当他们必须反击对手时，只能试图用自己所能驾驭的论据辩论，却很少尝试去驳斥对手的推理。因此，如果把解决问题的关键点落在论证上面，那双方最多落得旗鼓相当的结果。

这段时间，我继续和父亲一起阅读拉丁语和希腊语书籍，学习书中的语言和思想。这其中包括许多演说家，特别是狄摩西尼的著作，他的一些主要演说我都烂熟于心，又以练习的方式，写了全面的分析。我把演说读给父亲，他会给我一些启发性的评价，通过他的评价，我注意到演讲中有关雅典制度的真知灼见，还有经常被举例说明的立法和政府原则，还指出演说家的技巧和艺术，即如何在听众的思维处在最佳接收状态时，抛出一切有利素材；如何通过循序渐进的暗示，悄悄把想法植入听众大脑，如果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表达，则会引起听众的反对意见。我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这里面的门道，但它们在脑海里播了种，又在适当的季节生根发芽了。与此同时，我还读了塔西佗、尤维纳利斯和昆体良全集。后者风格晦涩难懂，细节论述学究气十足，鲜有人涉足其中，因此难以得到足够的赏识。他的书无异于一部古人教育和文化思想的百科全书；虽然我是在非常年幼时读过他的书，但我一生中很多有价值的

观点都清晰地源自于他的作品。在这时，我还第一次读了柏拉图最重要的对话录，特别是《高尔吉亚篇》、《普罗泰哥拉篇》和《共和政体》。父亲认为柏拉图在精神方面对他的影响最大，他亦常常向年轻学生推荐他的文章，当然也向我推荐。他的苏格拉底问答法是一种非常卓越的训练方法，此法又以柏拉图式对话为其范例，用以纠正错误，在知识允许的情况下拨乱反正。所谓知识允许的情况是指在通俗的语法及措辞的指导下，能够产生大量联想意义的理解。这种精确、透彻的问答法，让表述模糊笼统的人必须用明确的术语为自己圆场，要么就只能承认自己也一头雾水，搞不清状况。该方法永远用具体的例子检验所有的一般性陈述，对抽象且涵义广泛的术语进行形式上的限定，这需要确定某个更大的类别，这一类别包含海量术语，通过对相关事物进行一系列精确的区分，标出它的界限和定义，把这些术语细化到需要的程度——这一切都属于精确思考的训练，也都是十分宝贵的。这些东西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能抓住我的注意力，且成为我思想的一部分。从那时起，我就认为受益于该研究模式并不遗余力地推行它的人才更应该得到柏拉图主义者的称号，那些仅仅采用某些武断结论而出名的人是配不上这个称号的，因为这些结论都源于柏拉图最晦涩难懂的著作，要是从他的思想和作品特征来看，怕是连他自己都不确定这些到底是诗歌式幻想，还是哲学式猜想。

在读柏拉图和狄摩西尼时，我已经扫清了语言上的困难了，所以父亲要求我在通读这些作者的作品时，不要逐句解释，而是大声朗读出来，再回答他的问题。但是，因为父亲非常注重朗诵法（他在这方面相当在行），所以给他朗读是件很痛苦的事。在他要求我做的所有事情当中，只有这件事对于我来说总也做不好，总让他大为光火。他在朗诵艺术原则方面造诣比较深，尤其在最容易忽略的部分，他思考过很多，比如音调变化，朗诵法的作者称它为韵律（其一指和发音对比，另一指措辞形成对比），并基于对句子的逻辑分析，将其归纳成准则。他让我牢记这些准则，每每违